

◎文学新地理④

山西文学：坚守与嬗变

杜学文

历史上山西有“表里山河”之誉。山河环护，土厚水深，连通南北，四季分明。这样的地理文化环境，孕育了与之匹配的文明和文学。当我们打开中国文学史，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击壤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我们的先人开始文学的表达时，就具备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能力。他们追求的是对人类生活恒久性的描写。这使山西文学表现出厚重、质朴、浑大的品格。

当文学的长卷延展至40年前，那个注定要发生中国重大变革的时期，山西的文学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早逝的诗人文武斌欣喜地呼喊着，春来了！来了——来了——来得这样突然这样快！马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作家创作了《结婚现场会》《在招待所的日子里》等一批作品，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深切地呼唤新的时代的到来。这种呼唤，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声音，而且是那一时期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必然。

实际上山西作家对时代的这种敏感性并不是由此开始。稍早之前即有焦祖尧创作的长篇小说《总工程师与他的女儿》《跋涉者》面世。这些作品已经表现出生活中渴求变革的积极力量。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引起文坛关注。成一的《顶凌下种》、张石山的《碾柄韩宝山》、柯云路的《三千万》等均是时代变革的呼唤。而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夜与昼》以宏阔广大的社会生活、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以及人民内心的热切期盼，是具有史诗品格的时代画卷。他们的作品洋溢着热情与理想，对未来中国充满了希望，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晋军崛起”。

相对于老一辈作家而言，更年轻的“晋军”作家出现，使山西文学呈现出生龙活虎、多姿多彩的局面。他们虽然在起步之初深受赵树理等“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实践之后不再追求相近的创作风格，而是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分化与多样是那一时期山西文学发展演变的必然。

关注现实是总基调

总的来看，关注现实仍然是山西作家的总基调。张平从家庭苦情中出走，创作了一系列直面现实的作品。《天网》《国家干部》《十面埋伏》等成为社会现实的文学镜像，深刻表现了中国变革的艰难进程。其长篇小说《抉择》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钟道新则关注最具前沿性的社会生活。其作品如《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超导》《特别提款权》等表现出作家在知识储备、艺术表达诸多方面的独特造诣。王东满、田东照、周宗奇等人的小说密切关注现实生活，董耀章、张不

代、梁志宏、张承信等人的诗歌呼唤新的时代到来。而潞潞、秦岭、郭新民等人均为新时期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另一些山西作家则从更深远的层面来表现中国。他们也许描写了现实，但其目的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即时性展示，而是企图揭示出隐藏在生活表象之后的文化内涵，力图揭示出大变革时代民族文化的某种基因与作



张平



刘慈欣



蒋韵



葛水平



李锐



吕新

用。其中，有成一《陌生的夏天》系列、张石山《仇犹遗风录》系列、李锐《厚土》系列等。特别是长篇小说如成一的《游戏》《白银谷》《茶道青红》，李锐的《无风之树》《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高岸的《世界正年轻》等，具有更为深广的文化意味，努力从文化哲学的层面来思考民族精神。他们塑造的人物，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还具备了某种“符号”意义。需要提到的是女作家蒋韵，不论早期《完美的旅行》，还是获鲁迅文学奖的《心爱的树》，乃至近期的《晚涛》《水岸云庐》，总是在略带伤感的叙述中表现出人超越现实困境得以救赎的内在力量。而王祥夫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出生命所具有的温暖与希望。他以短篇小说《上边》获鲁迅文学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步入文坛的吕新，一直坚持着文学的先锋性写作。近年来，除中篇小说《白杨树的春天》获鲁迅文学奖外，长篇小说《下弦月》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因此获得了“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到中国先锋小说发展到今天的某种轨迹。

新锐力量引人注目

进入新世纪，更年轻的一批作家成长起来。他们被称为“三晋新锐”。葛水平以

《喊山》《地气》《甩鞭》等中篇小说引起文坛瞩目，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其长篇小说《裸地》力图展现上世纪初以来半个多世纪乡村的沧桑巨变，具有宏大的历史品格。李骏虎在创作了一系列城市题材小说后又着力揭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变革，体现出浓郁的文化意味，并以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鲁迅文学奖。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

表现力与艺术可能性。玄武、赵树义、阎文盛、白琳、汉家等人均为新散文的重要作家。另一些作家更多地体现出散文的传统意味，并不断求新求变。其中如燕治国、王祥夫、乔忠延、葛水平、蒋殊、手指等均十分活跃。

在诗歌领域，雷霆、张二棍、石头、张琳等引人注目。有人认为，在报告文学领域存在一种“山西现象”。如果不是讨论创作风格，而是从创作者的数量来看，这种观点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老一代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等均有报告文学作品问世。焦祖尧的《黄河落日走山西》等影响广泛。张平的《孤儿泪》、张锐锋的《鼎立南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麦天枢有《西部在移民》《昨天》等重要作品。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赵瑜与哲夫两位作家。赵瑜创作了包括《中国的要害》《强国梦》《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等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并以《革命百里洲》获鲁迅文学奖。他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哲夫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他特别关注生态问题，有《中国档案》《黄河追踪》《世纪之痒》等大量作品。近期又有《水土中国》面世，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卫士”。此外，鲁顺民、黄凤、籍满天、聂还贵、魏荣汉、郭万新、江雪等均有重要作品。山西的传记文学也独树一帜。韩石山的《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张哈传》等影响广泛。其作品文笔生动，考证细致，常有人所未见之论。寓真于《张伯驹身世钩沉》，周宗奇有《潞盐传》《忧乐天下：范仲淹传》，王东满有《姚奠中》，陈为人有《兼爱者：墨子传》《柳宗元传》，乔忠延有《秦汉卿传》等。此外，沈琨、苏华、张卫平、李金山、宁志荣等均有传记作品问世。

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兴起。高长虹等人发起狂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社团。他们的作品，借鉴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强调主观倾诉，呼唤改造社会，为中国文学的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大批作家来到山西，参与抗战，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根据地出现了赵树理、马烽等一批本土作家。他们适应时代要求，向传统与民间学习，与其他作家一道完成了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转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山西作家坚守文学使命，关注国事民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艺术手法，不断求新求变，为中国新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正如山西的地形颇似一片飞动的桑叶，山西的文学正呈现出勃然生机，在黄土高原的高山厚土中开放着灿烂之花。

非虚构写作独树一帜

上世纪末，伴随着艺术领域的实验风潮，文学领域的探索也风生水起。新散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惹人注目地登上舞台。张锐锋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一系列作品如《祖先的深度》《皱纹》《卡夫卡谜题》等成为新散文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以超常规的篇幅、感悟性的思考极大地拓展了散文的



◎作家谈

当我翻开孤独

枫雨（美国）

一说到孤独，有人会觉得这是文人墨客的矫情。其实文人和孤独是分不开的。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把孤独提升到美学的角度，虽然我觉得未必如此夸张，但我也理解并同意他的观点：如果梵高不孤独，如果竹林七贤不孤独，世界会失去很多美好的作品及人格之美的展现。因为只有让自己净空，才有空间接纳更多，进行创造，能够“独与天地游”。这也是文人对孤独情有独钟的缘故。

海外环境让我们对本土有了距离，有了孤独的可能性，这正是审视并叩问心灵的大好时机。翻开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始我真没有立刻被吸引住。尤其那些拗口的拉丁美洲人名不断重复出现，让我在弄清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时颇费脑细胞。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因素也是羁绊——那片土地离我们东方太远，我很难了解和想象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尤其是一开始就是炼金术、神秘的吉普赛预言还有那些占卜术，这三个一直缠绕小说的西方三大法术，的确扑朔迷离。

但是在逐步了解人物走向之后，读者会逐渐“进入角色”。好像有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你的内心。你会“懂得”人物那些似乎违背常理的古怪行为，你会对看似荒诞不经的人物关系和故事发展有深入的同情和理解。难怪秘鲁作家聂鲁达称其为继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的西语作品。

但其实我们认识的这本著作，远远不是它有魔幻现实主义这么简单肤浅。马尔克斯自己说小说的主题“不是神秘，不是爱，也不是政治，而是孤独。”小说讲述人类自我探索，在神幻中不断试验发现，以及后来讲到的战争、情爱的错位等等，其实是人类永恒的寻求。在这一点上，无论在地球哪个角落，都是不断在探寻的问题。人类在战争、政治、哲学和死亡等等过程中，都无法停止思考。

其实孤独就是自我意识。马尔克斯的理想是要从孤独走向人类终极团结，这是他的诉求，也是很多西方作家的诉求。法国作家加缪是如此，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也是如此。我们东方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一个作家，如果不孤独就无法思考；如果不是向着自己的心提问，就没法做到真正的人文关怀。海外作者有孤独的优势，可以提高自我意识，进行内心批判审查，为社会写出有良心的作品来。

文学永恒。

石一枫携新作《借命而生》

对话五大文学期刊主编

刘洋

日前，《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西湖》五大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与作家石一枫在北京大学采薇阁进行对话。五位主编从文学、社会的角度对石一枫新作《借命而生》进行深入探讨，也梳理了石一枫创作道路的成长与收获，并给予《借命而生》高度肯定。

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借命而生》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从一桩1988年的盗窃案写起，时间跨越30年，讲述了警察与逃犯之间的精彩故事。两个越狱的嫌犯姚斌彬和许文革，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追捕中杜湘东渐渐发

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三个主人公都是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他们处境不同、职业不同，却都以强硬的姿态面对生活，坚守自己的善良和价值。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借命而生》的故事连带出来的是中国这三二十年的生活，将时代性和思想深刻性结合在一起。石一枫的关键词在“生”上，讲述人怎么找到生路的故事，讲述生命的价值。

《收获》主编程永新说，石一枫总是能寻找社会生活敏感的点，不仅是为问题而问

题，他其实是有提升的，有人性的温暖，他对笔下的人物总有一种包容、慈悲的同情。

《十月》主编陈东捷评价，《借命而生》是石一枫又一篇致敬经典、致敬时代的野心之作。他通过人物的命运把现实串通起来。石一枫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

《当代》主编孔令燕称，石一枫是近年让人惊喜的一个青年作家，他的作品用典型的细节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借命而生》这个作品是他走向成熟的几个标志之一，从关注自身到关注自身以外的东西，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精神。



《西湖》主编吴玄认为，看《借命而生》最大的感受就是石一枫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把对社会层面的批判转成了对人性的关怀。这部小说是对人性的探索。

“《借命而生》最早的动机是要写一个第三人称的作品，写一个跟我的个人生活不一样的故事。以第三人称写与我不重合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石一枫认为自己的写作要克服禀赋上的弱点，发挥禀赋上的长处，这是遇到的挑战。

◎新作评介

追忆的温馨

——读刘仁前《楚水风物》

庞余亮

这世上最幸福的时刻，无疑是能够从追忆那已逝的似水一般的年华。

比如那个躺在蓝屋子里的普鲁斯特，他说：“她让人端来一个扁扁鼓鼓的点心，名叫小玛德莱娜，看上去像是用扇贝型模子配制的。当下，我面对阴郁的白天和无望的明天正闷闷不乐，机械地舀了一勺我先前泡着点心的茶，送进嘴里。就在这口带着蛋糕屑的茶碰到上腭的一刻，我猛然一震，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奇妙的东西。一种美不可言的快感传遍我全身，使我感到超然升华，但又

不解其缘由。”

令我们超然升华还有刘仁前这本《楚水风物》。普鲁斯特念念不忘他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刘仁前则在反复书写他老家的菱角、河蚌啊、风车啊、田螺啊、粽箬啊、麻雀啊、野鸭啊、扁豆啊、芋头啊、螺蛳啊、春卷啊。除了有楚水之外的人熟悉的物件外，还有例如高瓜啊、连根菜啊、虎头鲨啊、毛鱼啊等我们心知肚明的风物。

是的，图腾！从风中的摇曳到水底的悠游，从旷野的精灵再到农家的菜地，他一笔

一画地写下了时令的味道，记录了民间的情感。故乡的六十三样物事，六十三样图腾，刘仁前反复咀嚼，反复追忆，他的上腭，他的舌尖，他从头部到尾骨的震颤，不仅是吃货的美不可言的快感，更是一个游子满怀乡愁的震颤。

算起来，我和刘仁前是同吃一河水同住一个村庄，同说一样的乡言土语，包括一些土生土长的歇后语。现在离开家乡，在长江边生活了快20年，读《楚水风物》，回乡的忧伤和温馨扑面而来。比如那篇“歪”茨

四川讲经典：杜甫的形象

由十月文学院策划主办的大型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名家讲经典”第十场讲座日前在京举办。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西川为广大学子讲解了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诗歌。西川的讲座进入了唐代这个诗歌辉煌时代的现场，以诗人的敏锐与学者的洞察力，还原了唐代盛大的诗歌氛围，更新了杜甫的形象。

杜甫与李白在唐代双峰并峙，互为同道，合称“李杜”。杜甫诗风沉郁顿挫，深切硬朗。杜甫以儒家者流自居，心怀尧舜之政治理想，继承孔门之人生态度，既“日夕思朝廷”，又“穷年忧黎元”，心怀国家天下，忠君，爱国，爱众生。同时，他又是一个对诗歌保有虔诚信念的诗歌信徒，立志将诗歌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诗是吾家事”“自吟诗送老”。他留下的诗篇至今光芒不减，动人肺腑，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美的来源。

（洛文）